

SINGAPORE 新加坡 IN PICTURES

1 8 1 9 — 1 9 4 5

历史图片集



星洲日报与文化部联合出版

Published by: Sin Chew Jit Poh & Ministry of Culture

SINGAPORE 新加坡 IN PICTURES 1 8 1 9 — 1 9 4 5 历史图片集

编辑委员会

顾问:

欧进福博士
黄麟根教授

总编辑:

李卫国, 黄溢华

编辑:

李奕志, 张清江

委员:

林秀香, 林源福
莊钦永, 林孝胜
张夏韩

设计:

李智松

EDITORIAL COMMITTEE

ADVISORS:

Dr. Ow Chin Hock
Prof. Wong Lin Ken

CHIEF EDITORS:

Lee Wai Kok
Frank Wong Yut Wah

EDITORS:

Lee Yik Chee
Chang Chin Chiang

MEMBERS:

Chionh Siew Yong (Mrs.)
Lim Guan Hock
David Chng Khin Yong
Lim How Seng
Teo Han Wue

GRAPHICS:

Lee Tee Song

星洲日报(新加坡)有限公司
SIN CHEW JIT POH
(SINGAPORE) LTD.
19 Keppel Road, Singapore 0208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联合出版
MAY, 1981

每本售价: \$9.00

献词

MESSAGE

2

序

FOREWORD

3

新加坡历史的回顾

A VIEW OF OUR PAST

4

海岸景观与河景

WATERFRONT & RIVER SCENES

27

街道与村景

STREET & RURAL SCENES

53

建筑物

BUILDINGS

101

交通

TRANSPORT

129

人物与生活

PEOPLE & LIFE

143

历史事件

HISTORIC EVENTS

167

跋

POSTSCRIPT

181

索引

INDEX

183

献词 MESSAGE

文化部长丹那巴南先生 MR. S. DHANABALAN Minister for Culture

现代新加坡具有一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这段期间，它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人们所熟悉的地方标志不断消失。许多年轻的新加坡人对早期的新加坡只具有模糊的印象。

可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和了解，却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民和国家应具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对过去的发展如何塑造新加坡的实质环境、经济、政治、种族和文化特性等方面有所了解，我们就能对今日的情况有更好的认识。对过去的深切感受能帮助我们以更透切的眼光面对将来。

“1819年—1945年新加坡历史图片集”是由星洲日报和文化部联合出版的一本历史图片集。这些图片反映出新加坡从开埠到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这段时期的历史。我要在这里表扬那些对这项工作曾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士。这本历史图片集将唤起人民对新加坡历史发生更大的兴趣。我也很高兴地注意到这本图片集首五千本的售卖收入将捐给文化基金。

Modern Singapore has a history of 162 years. Vas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is period. Familiar landmarks have been disappearing.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have only a vague idea of what early Singapore was like.

Yet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our past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identity as a people and a nation. We can better appreciate 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if we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how past developments shaped the physical landscape, economy, politics, and ethn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 of Singapore. A good feel for the past can also help us to face the future with better perspective.

“Singapore in Pictures 1819-1945”, produced by Sin Chew Jit Poh,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brings to life, through pictures,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 would like to commend all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worthwhile project. It will generate greater interest among the public in Singapore's history. I also note with pleasure that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the first 5,000 copies will go to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Fund.

序 FOREWORD

欧进福博士 DR. OW CHIN HOCK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同过去的联系。如果我们没有过去的观念，对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认同，不免会有不完整的认识。我们的祖先是出身于各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移民。他们之间的混居共处、共同奋斗和共同愿望，给新加坡国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它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国家。由於新加坡秉承了他们的勤劳、节俭和牺牲的传统美德，遂能在最近的时期里，经得起政治、经济风暴的袭击，同时也使它在独立后的短短期间内，欣欣向荣，在国际大家庭里占据着应有的地位。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新加坡人对他们的过去，越来越感到兴趣。1980年文化部举办了一次新加坡历史照片展览会，结果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为配合这次展出而印行的 1,300 本「1870年代—1940年代新加坡历史照片集」，在一天之内便告售罄。其次，在学者当中，对新加坡历史的研究和出版，也多发生兴趣。

这本「1819年—1945年新加坡历史图片集」，是星洲日报和文化部，以华英两种语文联合编印的。它的出版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我应邀为这本图片集写序，深感荣幸。

History provides us the links with the past. Without a sense of the past, we can only have an incomplete sense of our identity as a nation. Our forefathers were immigra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sations. Their intermingling, common struggles and aspirations paved the way for the evolution of a Singapore nation as we know it today.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qualities of industry, thrift and sacrifice inherited from them, Singapore has been able to weath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orms in more recent times, and,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since independence, to prosper and take its rightful place in the world community of nations.

I am happy to note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interest among Singaporeans in their past. In 1980,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rganised an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s of old Singapore. The exhibition was a great success. The 1300 copies of "Singapore 1870s-1940s in Pictures", prin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xhibition, were sold out in a single day. There is also more interest among scholars to research and publish on Singapore's past.

This pictorial histo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in Pictures 1819-1945", with its bilingual text, published jointly by Sin Chew Jit Poh and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s most welcome. I am honoured to be invited to contribute this Foreword.

新加坡历史的回顾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黄麟根教授

1819年以前

每一个国家都有个起源。对许多国家来说，这个起源交织着事实和神话；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Singapore（新加坡）这个英文字眼，来自更古老的Singapura（新加坡拉）一词，原意是狮子城。这个名字的神秘色彩，蕴含着我国的起源。

「马来纪年」一书，一开始就讲述新加坡这个名字的起源。但是，「马来纪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史书。它收集的故事以马来宫廷及其统治者为主体，重点是放在马六甲苏丹国的丰功伟绩。这本史书是马六甲苏丹谕令撰写的，目的在于取悦这位苏丹。书中讲述的是旧日人物。作者把他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听到的关于这些人物的事蹟记录下来，而作者的父亲和祖父又是从上一辈那里耳闻他们的事蹟。在传述过程中，奇想和事实交织在一起。因此，「马来纪年」一书读起来趣味盎然。好的史书本当如此，但也给历史学家带来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必须透过故事讲述者的奇想，去伪存真，找出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马来纪年」仍不失为研究马来历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它的本质是历史真实。

那么，「马来纪年」对新加坡拉的起源，又是怎么讲的？

据「马来纪年」记载：新加坡早年称为淡马锡。朱南王在远征中国途中，曾在这里歇脚。朱南王是印度国王，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骁勇善战，威武无比。中国皇帝慑于朱南王的雄心，诉诸诡诈手段，阻遏了迫在眉睫的入侵行动。

中国皇帝派出船只驶往淡马锡，这些船只由掉光牙齿的年迈男人驾驶，船上载着一批货物：生锈的钉子和结满果子的树木。船上的人告诉朱南王说，中国与淡马锡远远隔开，他们在漫长旅途中衰老了，钉子生锈了，原本当作货品的种籽竟长成大树，而且开花结果了。

朱南王知难而退，打消入侵中国的念头。于是他决定深入海底，而这番事业的报酬是：他得以娶海龙王的公主为妻。

他们生下一子，名叫桑乌达玛。那时，室利佛逝马来帝国如日中天，巴林邦位于这个帝国中心。当桑乌达玛成为巴林邦统治者时，称为斯里·特里·布亚纳。有一次，斯里·特里·布亚纳出外狩猎，望见淡马锡洁白海岸。他深受吸引，决心到那里寻幽探险。他在新加坡河口湾登陆，遇见一只白色胸脯、黑色头颅和红色身躯的奇异动物。一名随从声称这是狮子。于是他决定留下，把这个岛建成一个城市，他以登陆时遇见的动物名称，把这个岛命名为新加坡拉。淡马锡就这样改称新加坡拉，并在斯里·特里·布亚纳及其四个继承人的经营下，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贸易港。

易港。它的财富引起了邻国的覬覦，朱拉人，泰人和爪哇人曾在不同时期入侵过新加坡拉。

「马来纪年」对新加坡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所作的记载，是饶有趣味的。这个记载之所以重要，因为正是根据这一点，新加坡被视为马六甲苏丹国马来开国君主所建立的第一个王国。葡萄牙的原始资料把斯里·特里·布亚纳称为拜里米苏拉，说他原是巴林邦王子，在苏门答腊举兵反抗满者伯夷的统治，因为叛乱失败而逃往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他杀死泰国封臣——当地的一名马来统治者，自立为王，五年后才被泰国一支舰队赶走。在麻坡和伯丹渡过九年逃亡生活，并于15世纪初在马六甲建国。

「马来纪年」对新加坡起源所作的记载，与葡萄牙的原始资料有出入。中国古籍的零碎证据和1365年出版的爪哇文献「纳加拉克勒达加玛」（这是把新加坡岛的一个殖民区称为淡马锡的东南亚地区最早文献），都未能给这个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马来纪年」关于新加坡起源的记载，不易获得接受的主要理由有二，此其一。

另一个理由是本区并无狮子，动物园当然例外。历史学家试图为这个岛被叫做新加坡拉探寻理由。所谓把老虎误作狮子的解释，他们是不能满意的。新加坡曾经是虎之岛，甚至到19世纪70年代，人们还可以在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猎虎。这种解释过于巧合，以致无法令人置信。况且，在1835年之前，并无关于目击老虎的报告。当老虎为患时，一般认为，它们是从柔佛游过海峡而来，至于这些老虎为什么泅水而至，从未有过充分的解释。一些历史学家把「新加坡拉」与爪哇的新格萨利（Singesari）联系在一起，或把满者伯夷初期一个佛教教派——它的信徒因其粗犷的宗教仪式而以狮子的可疑名声见称——联系在一起。

近代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斯里·特里·布亚纳就是拜里米苏拉，与新加坡最后一位统治者，马六甲王国建国者伊斯干达沙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伊斯干达沙是他皈依回教后改用的名字。拜里米苏拉被逐离巴林邦之后，在淡马锡重建势力。在这里，他为了表示不受满者伯夷的控制，登上狮座，把自己当成神的化身，沿袭回教传抵本区前东南亚君权采用的佛教仪式。于是，他把淡马锡易名为新加坡拉——狮子城，象征他摆脱满者伯夷而独立。根据这个观点，除了拜里米苏拉的短暂统治之外，新加坡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1819年莱佛士开创现代新加坡那年，还能见到狮子城的残存土墙——由海岸伸延大约一哩，沿勿拉士峇沙溪流（如今是小河）直抵武吉拉南甘（现为福康宁），以作为新加坡古代国王的葬地而闻名。

因此，近年来，历史学家针对「马来纪年」提到

新加坡过去一度是繁华的转口贸易港的说法表示怀疑。阿拉伯和新加坡早期文献以及9—10世纪和11世纪的锡兰及印度碑文出现过许多位置无法确定的东南亚贸易港的名字，其中之一可能就是新加坡。然而，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最先以无可辩驳的记述，断定新加坡在14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一个移殖区，人口包括华族和新加坡本土居民。从它预示着新加坡目前的多元种族特质来看，这点是意义深长的。那时的新加坡本土居民大概是马来人和海民，他们不是以农业和商业为生，而是在近海劫掠过往船只。诚然，直到19世纪初期，新加坡仍以海盗而闻名。

那时，新加坡并非它的居民和商人的安全移殖区。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新加坡还见于文献的早期历史，「完全是海盗和围攻的记述罢了」。不难想像，新加坡最初是海洋帝国室利佛逝的一个蕞尔马来贸易港，曾遭到朱拉的一次袭击。历史学家对于新加坡曾经遭受满者伯夷几次洗劫，意见纷纭。但它于公元1365年之前，成为这个爪哇帝国的一部分，是可以肯定的。当拜里米苏拉在新加坡建立统治权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是泰国的属地了。他是被泰国或满者伯夷远征军驱离新加坡。接着新加坡成为马六甲苏丹国的附庸，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特别是在1613年葡人洗劫新加坡河口湾一座马来人前哨之后，新加坡的地位每况愈下。

柔佛帝国继承了马六甲苏丹国之后，新加坡及其邻近岛屿、柔佛和东苏门答腊的部分地区，组成了天猛公的采邑。柔佛苏丹最后决定在廖内凌牙群岛定居。19世纪初，天猛公阿都拉曼在狮子城的旧址建立了一个马来渔村。当莱佛士于1819年1月在新加坡登陆时，岛上人口约莫一千，其中中华人和马来人的数目大致相同，约二三十人，其余是海民。他们分散在实里达、加冷、新加坡河口和现在发巴码头周围地区的四个聚落。我们对1819年前新加坡历史的了解，说明它的发展与室利佛逝、满者伯夷、泰国、马六甲和柔佛苏丹国是分不开的。随着东南亚早期帝国命运的变迁，它已经数易其太上皇。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对于十九世纪以前新加坡无法成为重要贸易中心一点仍未能作出充分的解释。

众所周知，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造成这个贸易港经济繁荣的原因。座落在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处于来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十字路口。在帆船时代，由于船只必须依靠季候风的改变往返东南亚，马来群岛的贸易，自然集中于有季候风之利的航路，而贸易的展开必须基于商业中心的原则才能做到。新加坡一向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历史学家对于新加坡为什么在19世纪初无法扮演这个角色，迄今仍未能提供理由充分的答案。在这之前的不同时期，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举足轻重贸易中心，是这样一

些地方：如室利佛逝时代的巴林邦、占碑或末罗喻，马来苏丹以及较后葡人统治下的马六甲，荷兰统治下的椰加达（当时称为巴达维亚），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冒头的汶莱和廖内。用历史的时间尺度衡量，新加坡是最近才崛起的贸易中心。这个贸易中心的出现，是19世纪初期事态发展的结果，构成世界贸易型式和贸易关系的一部分。新的世界贸易型式和贸易关系，是在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和拥有最强大海军的英国支配之下。因此，新加坡是立足于现代基础之上，进而演变为一个国家。

新加坡的开埠

新加坡之所以成为英国殖民地，是因为英国在马六甲海峡南端极需一个港口，以完成对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重要水道的支配。英国为了阻止法国成为欧洲霸主，曾与法国及其同盟国发生4次战争，从中逐渐认识到取得这一战略支配地位的必要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国必须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拥有海上控制权。

英法第一次「七年战争」（1756—1763）结束时，英国崛起为印度的支配势力。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着手开发印度的资源，以扩展它与中国之间的贸易。19世纪初期，中英贸易已成为英国、中国与印度三角贸易的重要部分。因此，以法国为对抗目标的英国防务，包括保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它的中心环节是海上控制权，不仅拥有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上控制权，也要拥有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

在美国革命战争（1775—1783）期间海战经验充实下的「七年战争」教训，导致莱特于1786年开辟檳城。位于马六甲海峡北端，檳城是孟加拉湾东面的潜在海军基地，也是通往中国贸易航路上的前沿港口。当时荷兰是东南亚的主要欧洲势力之一，只要它在英法角逐中保持中立，马六甲海峡对英国船只和贸易就有安全可言。法国革命战争（1793—1802）期间，荷兰站在法国一方。因此，为了确保印度和英国在马六甲海峡的通航，以及它们与中国贸易的安全，英国必须首先占领荷属马六甲，然后占领荷属印尼的其余部分。

在所有这些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崛起为西北欧的海上霸主。它是实现欧洲和解的主要国家之一。这个和解在英法第一次战争爆发之前，差不多被压抑了整百年。在这个和解之下，印度的安全和以及使荷兰继续成为欧洲反法堡垒，是英国主要国家目标的一部分。法国和荷兰两股欧洲势力完全被排斥在印度之外。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在战争年代夺取了毛里求斯、好望角和锡兰，它的海军在印度洋取得支配地位。然而，由于考虑到欧洲的关系，英国让荷兰恢复荷属印尼和马六甲的地位。

这项决策使好望角以东一些英国当地官员感到惊慌。因为具有战略地位的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通往南中国海的南部咽喉，将由荷兰支配。在这个事件中，虽然莱佛士和其他几名官员有着相同的计划，但是，因为他更加积极进取，更加善辩，终于成功地说服哈斯廷斯勋爵委任他「在马六甲上方建立一个哨站，以期控制扼这些海峡的南部咽喉」。因此，莱佛士成为新加坡现代殖民地的开埠者。

如同许多在自己开辟的殖民地飞黄腾达的人士那样，莱佛士也是靠本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莱佛士诞生于1781年，教育方面靠自学。他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书记，后来平步青云，三十岁时升任爪哇副总督，任期是1811年至1816年。1818年，他被委为明古连总督（他一直担任了五年到退休为止）。莱佛士在爪哇任职期间，构想了建立在英占荷属领土基础上的大英帝国。但是，由于英国在战争结束后推行的政策，允许荷兰成为本区一股势力，使这个构想以及他谋求扩大英国在马来群岛势力的其他努力流于失败。事实上，如果得不到的哈斯廷斯的支持和新加坡的闪电式成功，甚至莱佛士在新加坡的功业，都不会获得伦敦英国当局的承认。

莱佛士和哈斯廷斯的优先发展目标，本来不是新加坡，而是廖内。然而，在廖内，荷兰重新坚持它最初于1784年建立的保护地位，抢先把英国势力排除在外。由于寻觅不到其他适当的地点，最后才选中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是当时以廖内为中心的柔佛帝国的残存部分。为了给英国获取新加坡提供法律基础，莱佛士、天猛公阿都拉曼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胡欣签署一项条约，条约上注明日期是2月6日。胡欣曾要求继承柔佛王国王位，所以莱佛士把他带到新加坡，宣布他为苏丹，以便达到缔约的目的。

荷兰对莱佛士行动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新加坡殖民地的前途，取决于为解决英国占有新加坡的合法性而耽搁的日子，因为这个时期充分体现了新加坡对马来群岛和孟加拉以东英国贸易的经济和战略价值。

根据1824年英荷条约中达致的协议，荷兰放弃马六甲主权和对新加坡的一切要求，撤出它在马来半岛的利益，而且不排除英国在荷属马来群岛的贸易活动。英国采取相应行动，放弃明古连和对新加坡海峡以南岛屿的一切领土要求，同时也放弃它在苏门答腊的利益。这些以及条约中的其他条款，瓦解了柔佛苏丹国，实际上把马六甲海峡划分为英国势力范围和荷兰势力范围。从历史的角度回顾，除了英国势力延伸到目前的东马和汶莱所引起的争执之外，1824年英荷条约含蓄地承认，最符合英荷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各自把势力伸入还受本地人支配下的马来半岛和群岛的其他部分，以及把其他强国排除在本区之外。同时，由于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全球第一号强国和东南亚的海

上霸主，它在维持泰国的完整性和分割东南亚其他地区方面，扮演着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在分割东南亚其余地区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里出现了现今的缅甸、柬埔寨、印尼、寮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

新加坡开埠之初，是作为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前哨，但管辖权操在明古连。1832年，它成为海峡殖民地政府所在地。这个海峡殖民地还包括姐妹港马六甲和檳城在内，但仍然附属于印度。1867年，海峡殖民地成为皇家殖民地，由伦敦政府直接管辖。如同其他皇家殖民地那样，新加坡由英国殖民部委任的一名总督负责管辖，协助总督的是一个官方委员占多数的行政院和一个打从1924年起官委和非官委代表就各占一半的立法院。作为东南亚英国势力的总部，新加坡在英国向马来半岛扩张势力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在英国把势力伸向现今的汶莱和东马来西亚方面发挥作用。由于英国是东南亚的支配性军事强国，我们将看到，新加坡的防卫在大英帝国和东南亚历史上具有战略意义，而这是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时完全没有预见到的。

12年前，我们庆祝莱佛士开辟新加坡150周年。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揣测：如果历史学家以超然的态度指出莱佛士在162年前登陆新加坡时，并未计划为一个独立的多元种族共和国奠定基础，他是不会气恼的。莱佛士首先是英国爱国者。他开辟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沉重打击英国在本区的主要商业敌人——荷兰。占有这个岛，英国在东南亚和中国的贸易就可以扩展和受到保护。英国的国威不但将提高，而且也会受人敬重。莱佛士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他的同胞却要在几年后，才认识到他的服务对英国所作的应有贡献。莱佛士有其政治目标，但他的政治目标与激励现代民族主义领袖的政治目标是不同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150年后，在他所开辟的贸易港的基础上，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脱颖而出。

莱佛士和他的同代人，以及接替他们的历任英国总督和公务员，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和献身精神治理新加坡。但是，新加坡的经济进展是英国传播文明使命不言而喻的证明，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有人怀疑英国统治的永恒性。回顾过去，不难理解他们深信英国统治的永恒性，因为这导致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社会，和缔造经济发展的基础结构。英国总督所建造的雄伟公共建筑物，有形地证明了他们对前途充满期望和信心。这些公共建筑物立足于较建造者的情感和信仰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它们的生存超越了英国的统治，正如在它的激励下成长的多元种族社会那样。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殖民主义已从生活真实转变为历史的记忆。大约17年前，英国体面地放弃不再希望扮演的和道义上不再认为是应当维护的角色。已经

消逝的殖民地时代，是我们无法抹煞的历史遗迹。按事物的性质来说，它不能引起人们对往昔的缅怀，不论我们的先辈与其他民族的经验相比，受到如何良好的治理。但是，我们倒是有可能把不狂暴的反殖斗争的回忆抛诸脑后，完整无损地保留维多利亚纪念堂前的莱佛士雕像，保留用以命名我国许多桥樑、街道、公共建筑物等傑出总督和公务员的姓名。

在东南亚历史上，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形成是独特的。如果我们缺乏作为一个古国的历史回忆，我们也没有对传统敌人的满怀仇恨，我们的周围也没有传统的友国。在特殊意义下，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国家，我们是名符其实的移民国家。

多元种族社会的成长

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印度、印尼和西马（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居到这里。与英国公务员不同，他们极少或没有留下关于他们活动的文献。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主要是来自英国官员的记录——或者是政府文件和回忆录，或者是西方旅行家和记者的观感。由于殖民地当局需要立法，我们从这些文件中主要认识到与殖民地当局有关的活动。因此，我们对华人的认识多于对其他种族的认识，对殖民统治下华人社会的认识多于对其他种族社会的认识，如华人私会党组织以及移民、娼妓、包税一类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控制在这些私会党手中，直至19世纪末英国成功地瓦解他们的势力为止。我们还在等待有系统地蒐集已知的或有待发掘的关于华人的原始资料，让历史学家翻阅，再补充以英国官方记录的证据，增进我们对殖民统治下的华人历史的知识。我们对华族先辈的这番议论，同样适用于我国非华族祖先。

对于在殖民时代大有成就的先辈，我们知道得很少。他们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有传记。人们之所以还记得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姓名已化为街道、慈善机构、商业机构、金融机构、名气不大的小规模助学金和奖学金名称。

大多数前来这里拓荒的祖先，是身无分文和目不识丁的单身劳工。他们的本意是到这里赚钱，然后荣归故里。但是，他们往往又回到谋生之地，终于在这里定居下来，那是因为在新的加坡谋生比在本土谋生来得容易，尽管早期拓荒年代是艰辛的。随着越来越多女性来到新加坡——尤其是在1860年中国政府合法化移民之后，而且又得助于汽船的发展——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人日益增加，即使这些人仍然汇款回去，而且经常回返故国省亲。在介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岁月，新加坡日益成为安居的社区。

但是，直到1947年之后，新加坡人口的自然增长，才超越移民的数目。这是因为除了马来人和欧亚籍

人之外，其他种族的男性成员远远超过女性成员。华族的性别比例，在1930年之后才显著改善。在那一年，殖民地当局限制男性移民进入新加坡，但允许女性和12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自由进入。在这之后，新加坡出世的华人，数目开始超越华籍移民。介于1931年至1947之间，马来人口的增长出现相反的趋势。在新加坡，马来移民的人数，超过在新加坡诞生的马来人，比例是5：1。这些马来移民，大多来自长堤彼岸的西马来西亚。

在1830年之前，新加坡各族人口之中，以马来人占最多数。随后，华族在人数上占优势。事实上，自从那时以来，新加坡的种族组成，排位大致不变：华人最多，马来人次之，再次是印度人，最后是其种族，包括阿拉伯人、欧亚籍人和欧洲人。

尽管马来人口增加，但是，在英国统治下，20年内它便失去优势地位。海民聚落最终消失，这是因为海民与马来人同化，或迁至柔佛。直到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市的边缘地区，如丹戎禺岸外，一些海民聚落仍然单独存在。

与建屋局组屋区内各族杂居的情形不同，我们的祖先是散居在城市的不同地带。照莱佛士的城市计划，华人定居在后来被称为牛车水一带。政府建筑物座落在新加坡河北岸，与我们今日见到的景观相同。商业区被划定在现今的莱佛士坊——那里原本是小丘，铲平后称为商业广场。19世纪80年代直落亚逸湾填土后面积扩大，形成现今的直落亚逸盆地、安顺和罗敏申路一带地区。新加坡河北岸的天猛公村，迁移到丹絨巴葛与直落布兰雅之间的一个地段。甘榜格南归给苏丹及其追随者，而毗邻甘榜格南的土地，则分配给阿拉伯人和武吉黑人。马来人也被安顿在马六甲村，並分布在南部岛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来人又在马来村、芽笼士乃和巴西班让发展了新移殖区。新加坡河上游较远的土地，分配给印度人；但是，印度人的商业区终于在谐街以及珠烈街和马吉街一带发展起来，而印度回教徒则在亚拉街邻区做生意。一些印度回教徒与马来妇女结婚，他们的子女被称印马混籍人。1830年，淡米尔回教徒兴建了「印度人回教堂」。

随着新加坡发展起来，原有聚族而居的地区，因为出现种族的移殖区而削弱了种族单元性。但是，在新加坡自治之后开始兴建组屋区以前，还是看得出莱佛士对新加坡镇布局的长远影响：不同种族分居在划定的地区内。

不仅如此，他们在文化和语言上也是隔开的。各族内部之间，也在宗教和言语上进一步分化。因此，淡米尔人操淡米尔语，他们大多数是兴都教徒；而锡克人是以旁遮普语交谈，他们具有本身独特的宗教。即使是马来社会，也存在分化现象，这是因为尽管马来人语言相同，都信仰回教，但由于它的成员来自印

尼不同地区，他们按照各自的籍贯分开居住，如甘榜波扬，甘榜武吉士和甘榜爪哇，使用各自的方言。

华族是分化最严重的种族，按他们的方言、姓氏和籍贯而分成帮派。此外，还有在海峡殖民地诞生的华人——峇峇；虽然他们的基本身份是华人，但具有独特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使用马来混合语。和印度人一样，华人也信奉不同的宗教：有些是佛教徒，另一些是道教徒。只有基督教徒超越马来人以外的种族屏障。这也是各族与殖民地主人共同信奉的唯一宗教，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共同语言是英语。在殖民地时代，英语是少数语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少数语言不断扩展。新加坡是名符其实的「通天塔」，各族摩肩接踵，会聚一堂。

新加坡之所以发展成为多元种族社会，是因为英国推行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各族移民虽然发现这不是人人发财致富的地方，但至少比他们祖居地的生活来得好；尽管在迈出第一步时，尤其是在早期的拓荒岁月里，最初是吃尽苦头的。然而，作为移殖者，华族要比其他种族更受重视。

尽管新加坡是赚钱和谋生之地，但是，不应忘记，在最先抵步的我们祖先之中，契约劳工——猪仔——的比例很高。这些猪仔可以买卖，而且经常是在威逼或欺骗下被带到这里。直到进入本世纪之后，契约劳工才被定为非法：印度契约劳工于1910年被宣布为非法，中国契约劳工于1914年被宣布为非法，而印尼契约劳工于1932年被宣布为非法。在1872年之前，新加坡是安顿印度罪犯的地方。康宁炮台，现有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和皇后坊办公楼建筑物的最初几座楼宇，都是印度罪犯建成的。

英国人也是容忍的统治者。他们推行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政策。今日成为名胜的一些礼拜场所，在1870年之前几年已经落成，如苏丹回教堂，乌节路的湿婆神庙，以及直落亚逸区的天福宫。当地文化组织和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注册。

19世纪末之前，因为定居的人口为数不多，要求受教育的公开呼声仍未有所闻。莱佛士构想的多语中心的宏伟计划，在官方和公众两方面都得不到支持。

初期学校得以开办，实际上应归功于基督教会。这些学校教授英文和本地语言，包括方言在内。但是，在什么应是新加坡多元社会的共通语言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引起辩论，但在殖民地时代一直没有结论。英国人始终承认他们有责任促进马来教育。出于行政和贸易上的需要，尤其是20年代土生人士的要求，英国勉强地负起英文教育的责任。华文和印文教育则交由民间慈善机构办理，最后以交出控制权为代价，换取政府的一点资助。然而，政府既非情愿接受，又不是行而有效和有的放矢地应用这种控制权。

马来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把马来人维持在传统生

活方式内。回顾过去，这对马来人并无好处，因为它妨碍他们对迅速城市化的新加坡及其竞争性的经济制度的适应。华文和印文教育分别偏向中国和印度，而英文教育则是功利主义的，重点是放在发展对宗主国的效忠。因此，英国殖民地教育政策（更正确地说，也许是缺乏教育政策），进一步分化新加坡社会。如果它推迟新加坡意识的成长，却不能由于它无法朝向实现社会凝聚力和对本地的效忠而受到非议（而一些历史学家正是这么做的），因为期望英国官员扮演新加坡民族主义者的角色是不合理的。

英国殖民当局的整个基础，并不是为具有凝聚力的多元种族社会的成长而建立的。印度或英国当局没有为多元种族移民社会的管辖，制订一贯的政策。当局通过行政和司法的手段，谨慎地推动这个社会的一体化，以便为商业提供法律秩序的基础，进而使游移的拓荒移民演变为永恒的社会。新加坡成为皇家殖民地后，英国官员比那些以英属印度发号施令的官员更致力于这项工作。英属印度政府对海峡殖民地并不感到兴趣，而且认为它们是财政包袱。

但是，在英国统治的整个时期内，殖民当局的全部基础打上了通过首领——即所谓甲必丹制度——管辖各个社区的早期政策的烙印。这些首领在政府中并无正式职位，也没有官方权力。於柔佛统治者离开直落布兰雅，在柔佛扎根之后，马来人便失去了发言人；加上苏丹胡先的后裔隐没在甘榜格南，致使马来人的地位更加削弱。19世纪末，阿拉伯人扮演了某种领导角色，但是，介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加坡马来人，尤其是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人，不满阿拉伯人的自命不凡，日益要求由他们领导本族的权利。

华族通过同乡会、商会、尤其是私会党管理他们本身事务。私会党是从中国的三合会分化出来的组织。英国容忍「国中之国」的现象，因为这些私会党只是搞派系斗争，也因为它们对新移民提供有益的服务。但是，随着华民护卫司于1877年成立之后，英人开始了第一步管制，最后于1889年取缔所有私会党，并且处理过去是由私会党垄断的华人移民、苦力贩运和娼妓一类事务。

导致这项政策改变的原因，是私会党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介入半岛的马来政治，而且于1876年组织第一次公开的反政府暴乱（所谓邮政局骚乱事件），把一度是警方关注的问题转变为政治和内部安全问题。1889年之后，私会党蜕化为无足轻重的犯罪组织。殖民地政府成立了华民参事局，收集华人舆论，并在华人事务方面向政府提供意见。这个方案果然奏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局也把同样的方案，用以处理兴都教徒和回教徒事务：它成立了兴都教徒谘询局和回教徒谘询局。

新加坡交由英国殖民部直辖之后，亚洲人受到委任，加入立法议会。胡亚基（他的外号留给我们黄埔选区这个名字）是第一位华族立法议员，而第一位非官方马来立法议员是於1924年受委任。这一位非官方的马来立法议员是默哈末·友诺士。由于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惹兰友诺士，所以至今人们还记得他。在两次大战之间，市议会的代表，选自各族的组织，如中华总商会，海峡侨生协会、欧亚籍人协会、回教徒谘询局和兴都教徒谘询局。因此，英国统治者与其多元种族臣民之间的交流渠道，是通过种族路线，以致进一步加深了种族之间的分歧与隔阂。

19世纪中期，最著名的华人领袖是外号黄埔的胡亚基和余有进，他们两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19世纪末，出现了新加坡出生的新一代领袖，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章芳琳、陈若锦和余连城。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本地出生和受过大学训练的专业阶级，而且日益壮大。这个阶级最杰出的第一代领袖是林文庆和宋旺相。他们两人都是女皇奖学金的得奖人，是今日总统奖学金得奖人的先驱。1900年，他们成立了海峡侨生协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多数华族专业人士、立法议员和市议员，便是来自这个协会的成员。

海峡侨生协会的宗旨之一，是增强华人对宗主国的效忠。它发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加入志愿组织，对英国的作战努力慷慨捐输，同时在皇家庆典（如乔治五世和爱德华七世的加冕）或皇家驾幸新加坡（如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于1901年访问新加坡，以及康诺特公爵伉俪于1907年访问新加坡）时，表现他们的效忠精神。

海峡侨生逐渐成为对殖民政府起着影响的少数派，而且被赋与领导角色。他们积极兴办英文源流学校，发展大学教育：1912年创办爱德华七世医专，1928年创办莱佛士学院。他们也给妇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海峡侨生中间开始萌芽本地的政治要求。在1910年，接着又在1930年，当时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诸邦的总督兼最高专员，建议成立包括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诸邦在内的马来亚联邦。1930年的建议之所以失败，主要不是由于马来人的反对，而是由于另一种压力，要求维护皇家殖民地——尤其是新加坡，以及它的自由贸易地位和英帝国更大的利益。早在1910年，林文庆就曾支持马来亚联邦的建议；后来，马六甲出生的陈祯禄，又再给予大力支持。在伦敦的英国当局赞同马来亚联邦的构想。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年内，马来诸邦对这项建议的反对加强了，这是因为马来人认为，马来亚联邦的成立将破坏种族均衡，使马来人处于劣势。英国也反对让华人在殖民地行政和立法院有更大代表权的要求。

尽管海峡侨生表白对宗主国的效忠，但是，他们和华人社会其他成员的某些政治活动，引起英人——

尤其是马来人——的不信任。1877年，满清政府一改过去对东南亚华人漠不关心的传统政策，开始推行一项政策，以赢取华人对中国的效忠，继之而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也遵循这项政策。新加坡是本区华人最大的聚居地，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政府发生兴趣的焦点。中国民族主义被蓄意煽起，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活动，只是反映中国的政治局势。辛亥革命前，新加坡成为流亡国外的保皇派改革者和致力于推翻满清政权的共和派革命人士（如孙中山）的避难所。事实上，在新加坡筹募的经费，大大加速满清政府的最终倒台。在较后的战争年代，新加坡华人的政治活动，反映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抗日战争活动。

中国在新加坡促进民族主义的努力，产生了不幸的后果。首先，它导致受华文教育者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分裂。受华文教育者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类重要的新机构取得领导权。这个机构的起源，是1906年中国总领事主动的结果。其次，它助长了即使是一部分海峡侨生效忠的暧昧性。海峡侨生协会创始人林文庆，成立了国民党新加坡分部，领导所有遵循中国路线重组华文教育的运动，使海峡侨生重新浸濡在中华文化之中。第三，它导致新加坡华人国籍的复杂化。1909年，满清政府颁布了儿童国籍决定于父母国籍的原则。后来，这个原则也体现在1929年民国国籍法之中。根据这个国籍法，父亲是中国人，他们的子女也都是中国人。这就产生了英籍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一切发展对华人效忠居住地投下疑点，引起这样一种恐惧，就是新加坡可能发展成为所谓「第三中国」。

这种局面由于思想问题而更形复杂。1925年，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代理人到达新加坡，发动工作，最后发展成为马来亚共产党。回顾过去，介入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后果，因为它影响战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宪制发展，以及邻国对新加坡作为独立国的态度。回顾过去，意义深长的是，巫统前身「新加坡马来人联合会」于1926年成立时，不是为了反对英国统治，而是把保护马来人、对抗海峡侨生日益膨胀的政治抱负作为它的宗旨之一。

新加坡的商业成长

战前新加坡的经济历史是用统计数字写成的。它从声名狼藉的海盗渊藪，迅速崛起为东南亚殖民地区的第一号港口。在新加坡开埠之后的数十年内，它的崛起原因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新加坡崛起的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它所处的独特位置：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群岛中间，一侧是太平洋，另一侧是印度洋。它的战略位置上加上优良海港和理

想的泊碇处，确保了它在东南亚的卓越地位。它是中国舢舨，武吉士人和其他土著商船易于航行到的地点，也是往返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西方船只必经之地。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初，看来新加坡的地理优点可能会因为克拉地峡的开凿运河或铺设铁路而受到影响。但是，由于所节省的航程微不足道，而且不能补偿新加坡积累的贸易基本设施的利益。在往后的年代里，由于新加坡是第一个与全球建立了电报联系，同时也由于新加坡于1937年在加冷建造了第一座民用机场而成为重要的民航中心，致使它的贸易基本设施获得加强。

随着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通航，新加坡在东方贸易中成为轮船公司的枢纽。尽管海事工艺不断进步，轮船在漫长航程中还是非停泊补充燃料不可。因此，航路必须紧靠着南亚海岸，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岸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巽他海峡，而新加坡在欧洲与太平洋的贸易中，具有新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通过北美横渡太平洋的新航路曾被提出讨论，这导致巴拿马运河的开辟，但是，即使是从纽约运载货物到中国，利用苏伊士运河的航路仍然经济合算。当荷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开始赢回马来群岛部分的贸易之前，轮船的来临划出了从巴达维亚至新加坡的航路。我们的进取商人，沿着苏伊士至上海之间的轮船航线，充分发挥了新加坡转口贸易的潜能。

轮船的发展给海港泊碇处和贸易中心带来地理上的变化。从前，帆船泊碇处在驳船码头和新加坡河口湾一带。这么一来，贸易必然集中在新加坡河及其邻近地区。但是，轮船的吃水深度得多，必须停泊在新海港，这开始建造规模庞大的码头、货仓和修理设施，所有这一切如今是在新加坡港务局管理之下。港务局的前身是新加坡海警局，成立于1912年，目的是为了接管丹戎巴葛船坞公司私人企业。随着这些发展，莱佛士坊成为西方代理商、公司和银行的贸易中心，而驳船码头和新加坡河继续作为华人支配的贸易中心，经营东南亚土产生意。

新加坡成功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它的自由港地位。自由港的概念，从1786年至1801年曾在檳城实行过一个短暂时期。除此之外，在东南亚，这个概念对欧洲和当地政权所奉行的经济原则和惯例，是完全陌生的。久而久之，这个地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容任何殖民政府随意破坏。这个地位是新加坡赖以繁荣的秘诀，而这点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了。它导致荷兰人在马来群岛的以下战略地点建立自由港：寥内（1829），坤甸和三巴斯（1834），苏卡达纳（1837），望加锡（1847），棉兰佬和克马（1848），最后还有安汶、班达和特纳特（1852）。它们构成了荷兰传统的垄断贸易据点。但是，总的来说，新加坡并未败下阵来。它具有更优越的地理位置，比别人先

跑了许多步；更重要的是，贸易是在平等基础上对各族开放，而不像荷属印尼那样偏袒任何民族。

在19世纪的进程内，西方列强扩大对东南亚殖民统治的结果，加强了新加坡所具备的这些优点。西方殖民统治在频频发生的动乱之中创造了政治秩序，而且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甚至是荷兰人，在殖民地长时期推行了垄断政策之后，也从1870年开始选择私营企业路线。泰国虽然还保持独立，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也进入环球贸易体系。尽管东南亚与工业国之间的直接贸易不断成长，但新加坡在本区贸易的总增长中占有一份。英国在马来亚延伸它的殖民统治，导致锡业、较后是橡胶业、接着是棕油业的增长，使新加坡最受其惠。荷属印尼的橡胶业的发展，也使新加坡受惠，因为1911年新加坡成立了树胶公会之后，便成为重要的橡胶市场。

在介于两次战争的时期，新加坡成为如椰干、蔗糖、尤其是胶、锡一类原产品的重要转口中心。1920年，随着毛广岛油库的发展，新加坡成为远东石油供应中心。它也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从事黄梨罐头业和树胶加工业，并在现今是我国海军基地的布拉尼岛建立熔锡业。

总的来说，介于两次大战岁月是战前新加坡商业发展的最繁荣年代。20世纪30年代世界不景气，也影响到新加坡。但是，树胶和锡的价格，因为国际限制计划而支撑住。介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好景，产生了新一代的百万富翁，如胡文虎、李光前、陈家庚、郑古悦和陈六使。

在本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日益步上保护主义路线，新加坡的首要地位第一次面对一些重大挑战，因而不得不作出若干严酷的决定。首先，存在着新加坡在马来亚关税联盟基础上成为更大经济单元的一部分的问题。在权衡了工业化加关税联盟与作为转口贸易港继续发展的利弊后，大多数的观点是新加坡不应选择关税联盟，因为它的经济利益大体上超越马来亚。其次，当英国提出和发展帝国优惠制度时，新加坡及其姐妹殖民地被迫接受这个制度的原则，条件是这不会干预到它们的转口贸易。其结果是，1934年，英帝国政府强迫新加坡对日本纺织品实施限额。在这之前，也就是1930年，当局对中国男性移民的入境施加限制。这两项措施对树立已久的自由贸易原则起着削弱作用，而在1933年外籍人法令明文控制中国移民入境的条例，被认为是反华人的。帝国优惠，尤其是箝制日本的竞争，又从另一方面影响了新加坡。在马来亚，实施了贸易壁垒，以限制日本货的进入；这种情况突出说明一个事实，即新加坡与马来诸邦由同一个宗主国管辖，并不保障具有互惠互利的贸易政策。

经济民族主义比帝国优惠更沉重地打击了新加坡的贸易。支配东南亚的殖民势力，采纳的政策是与它

们的殖民地进行直接贸易，同时偏袒它们本国的厂家。本世纪30年代，当荷兰摒弃自由贸易和谋求印尼在食品和轻工业方面自给自足，新加坡与荷属印尼之间的贸易深受打击。因此，在30年代，新加坡商业繁荣的两大支柱——印尼和马来西亚——竟竖起壁垒对付新加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畸形的贸易局面，打乱了30年代的贸易趋势。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一个时代终于宣告结束。

在战前的岁月里，新加坡曾经作为东南亚多元种族的转口贸易港而繁荣过。在30年代之前，它对资金、技术诀窍、劳工、工艺的转移和贸易活动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使在那个时期，管制只限于华人移民的入境和日本货的自由流通，特别是贸易活动的种族分界。西方商人经营与西方有关的贸易，而亚洲内部的贸易主要落在华人手中。印度人着重于经营与印度有关的贸易，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诸邦印度人社会需要的商品。

总的来说：华人与西方的商业关系不存在严重摩擦，因为华商与西方商人所扮演的角色，相辅性大于竞争性。由于贸易迅速扩展，足以对华商和西方商人提供公平的牟利机会，他们之间你争我夺的现象很少见。事实上，新加坡崛起为重要港口，主要是英商和华商兴办企业的结果。尽管存在文化和种族上的歧异，以及社会生活的隔阂，华人和英人商界在殖民地政权下大有收获。他们可以无阻地赚钱，同时他们的怨言，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不满，往往得到政府的谅解和同情。他们的税务很轻，而且成功地挫败官方实施所得税的意图。税收主要来自国内产品税，特别是对鸦片消费的征税。直至1910年，鸦片税是由包税商负责征收。随后，鸦片的生产转入政府手中。直至本世纪20年代中期，鸦片税占税收50%以上。此后，鸦片税在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下降，1934年降至25%，它的地位被烟酒税和汽油税所取代。

因此，税务的担子落在人口中的贫穷阶层，尤其是华人身上。税收不敷社会服务方面的庞大开支。因为这个缘故，只有在介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繁荣年代，才花费较多钱于教育和公共卫生一类社会服务上。密尔顿医院、中央医院、板桥医院和特拉法加疗养院，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建造的。殖民地政权对劳工福利不感兴趣。它是在国民党——尤其是共产党——着手组织工人之后，才认真关注职工会的发展。但是，即使政府刚通过让工人组织工会的法律，战前正式注册的工会，连一间也没有。

战前的新加坡呈现一幅对殖民统治感到满意的图景。不同种族聚在一起，进行贸易；在最高层，有时也有社交往来。除此之外，他们生活于隔开的文化和种族社会内。这个多元种族社会的顶端是少数英国人、英国官员、英国商人和银行家，他们拥有最大的影

响力和最后的权威。回顾过去，不免要对这样一小批人如何能在这么长时期内行使大权感到惊讶。归根到底，英国人之所以能保住他们的地位，是因为各族从维持现状中获利，而且因为它们过于分化，以致无法联合行动。最重要的是，由于英国人是世界最大帝国的代表，因而产生了优越和不可战胜的魅力。因此，他们可以借助实力较小的警察部队进行统治——具有意义的是，这支警察部队，是由英国高级官员领导；警察部队各级人员并无华人，只有探员例外。然而，在新加坡沦陷之后，白人优越的神话被砸碎，再也无法挽回，它的后果是严重的。现在我们要把话题转入日本南侵。

新加坡的沦陷

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开辟是英法为争夺印度洋控制权和英国谋求扩大对华贸易的长期结果。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终于崛起为世界头号海上强国。英国对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了三个世纪断断续续和无情的战争之后，终于决定性地击败这些帝国，独霸海洋。由于无须捍卫陆上疆界，英国可以倾全力于发展海上势力。这么一来，它的敌对国家必须把更多经费花在陆军上，理由是它们的陆上疆界比北海和英吉利海峡更加暴露和更容易受到攻击。英国在海域驻扎一支强大海军，便足以孤立荷兰。如果英国在地中海拥有基地，便能切断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基于同样的地理缘由，如果英国忽略了海上天然边界的防卫，它的国土就会遭到入侵。因此，对英国来说，争取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对它保持友好关系，或至少保持中立，而不要投入敌对国的怀抱，尤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直到本世纪初，当美国和日本崛起并开始角逐海上强国地位时，英国只要重申它的海洋控制权，最终可以把欧洲大陆的敌国孤立起来，使它们无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取得联系。随着美国和日本崛起为海上强国，英国除了对欧洲的传统敌国还有约束力之外，已经永远丧失了扼杀其他海上劲敌的实力，原因是美国和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们的海军不容易受到毁灭性攻击。

然而，除了无法控制的严重局面之外，英国从未单纯依赖海军以自保。英国老早就从惨痛经验中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安全，依赖于以英国海军力量为基础的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它防止任何一国在西欧建立霸权。如果势力均衡遭到破坏，英国要恢复均势，非拥有和支持欧洲大陆盟国。并在大陆本土作战不可。英法战争突出说明英国也有必要取得地中海的海上控制权，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维持欧洲均势，也为了保卫印

度。埃及掌握保卫英属印度的钥匙之一，另一把钥匙是好角望。

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英国最先成为工业国，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的相对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显露。那次大战削弱了英国国势。在这之前，至少从「七年战争」以来，英国每打一仗，经济上就更加强大，而它的敌人却日益式微。

随着欧洲、日本和美国崛起为工业国和海上强国，它们在世界航路沿线建立基地，从而动摇英国的战略优势。譬如，法国在比泽达、达卡和狄果苏里斯建立基地，美国在马尼拉和夏威夷建立基地，苏联在亚瑟港建立基地，日本在本国岛屿建立基地。英国缺乏资源以维持早些时候的全球海上控制权；由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得普选权，越来越多的金钱必须花费在社会福利方面，而不是军备方面，致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政治上，英国的目的是防止法国和苏联联手，因为这将动摇欧洲的均势，削弱大英帝国——尤其是印度——的防务力量，並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利益。1889年，为了应付法苏联合海军构成的威胁，英国分别与英国和日本的海军结盟。1901年，英国承认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独霸地位。1902年，通过英日联盟，英国接受日本海军对西太平洋的控制权，以反击法苏海军支配地位——法国人在西贡，苏联人在亚瑟港建立这种地位。

但是，局势的发展证明，真正的威胁来自德国。这个威胁导致英国与法国（1904年）和苏联（1907年）合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之前两年，英国正式采纳了一项强国标准，这就是，它只能拥有一支强大到足以对付另一个海上强国的海军人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英国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必须在大陆作战，以维持欧洲均势。这场战争对新加坡的影响微不足道，唯一的事件是印度兵变。当时，军营内的旁遮普回教兵团叛乱，最后被一支七拼八凑包括日本水手和平民在内的不成比例的部队镇压下去。这次事件以及德国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在日本船只配合下被一支海军部队所击垮，突出说明英国在新加坡防务的脆弱性和对日本的依赖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在欧洲恢复势力均衡。然而，具有意义的是，欧洲的势力均衡，是在美国成为英国的盟国之后才建立的。与18世纪中期以来早先的世界战争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在经济上不是变得更强大，而是变得更弱了。英国在远东需要靠日本保持海洋及其属地的安全，以应付任何威胁，这就暴露了它的弱点。英国已经不再拥有作为亚洲和太平洋沿岸支配力量的资源。日本最先了解这种情况，並抓住机会扩大它的影响、贸易和领土，尤其

是在中国那里。

英国军事策略家很早就得出结论：东方的威胁将来自日本。他们也认识到，英国不再能够拥有强大到足以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的舰队。因此，1921年，他们采纳了所谓「新加坡战略」——那就是说，一旦与日本作战，主要舰队将被派到新加坡；为了容纳这支舰队，将在新加坡建造一座庞大的海军基地。他们也认识到：如果英国在欧洲受到威胁，这支主要舰队便无法开往新加坡。在制订这个战略时，英国军事策略家是假定，如果它与日本发生战争，美国将是它的盟国。

美国的国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比大战之初来得强大。它坚决反对日本的野心，也坚决反对英日联盟。1921年至1922年，英国为了迁就美国，结束它与法国的联盟，並在华盛顿会议上接受一项海军裁减方案；根据这项方案，英国同意英美拥有同等海军力量，而日本的海军力量则限制为美国或英国海军的五分之三。英美也达成防御工事协定，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在太平洋只能发展珍珠港为海军基地，而英国是唯一可在东南亚建立海军基地的西方国家。显而易见地，这个东南亚海军基地将建在新加坡。因此，归根到底，1941年12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时，保卫新加坡也就成为捍卫西方在本地区的统治和霸权。

那时，新加坡的海军基地刚刚建竣。基地的建造工程曾受到延误，而耽搁的原因不仅是缺乏经费，特别是因为这项工程必须取决于哪一个政党在英国执政。保守党主张建造基地，工党却不赞成。但是，新加坡没有一支主要舰队。最糟的是，英国必须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作战。况且直至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前，英国无法确定美国在战争中的立场。

本文不是讨论第二次世界的来龙去脉。即使是在1939年9月对德战争爆发之前，在战略上新加坡已被放弃。1937年的帝国会议把不列颠和新加坡的安全，当成大英帝国安全的基础。但是，1939年2月，新加坡是否能拥有一支舰队，取决于战争资源和欧战的形势。在法国溃败和意大利于1940年6月加入德国协同作战后，澳洲和纽西兰获得通知，一旦发生太平洋战争，它们必须依赖美国：新加坡将没有舰队，因为英国的舰队必须留在欧洲海域。日本南侵之前九个月，美国和日本曾达成秘密协议：一旦美国介入战争，同盟国庞大战略的优先目标，是击败德国。

这是合乎逻辑的决定，因为法国沦陷对英国的后果，与英国沦陷对美国的后果是一样的。因此，在军事部署上，东南亚毫无重要性可言。当战争打到马来亚时，新加坡不仅没有主力舰队，而且在兵员和军备竞争上，也输给苏联和北非。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向日本投降——大多数历史学家如今认为，这是不

可避免的事态发展。

在军事方面，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务崩溃只是暂时的。1945年9月12日，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击败，英国重新占领了它的殖民地。人们以欢悦和舒畅心情，欢迎英人的重返，因为他们结束了暴虐残酷的日本政权。但是，白人优越的神话已经永远破灭了。在战争中成长的一代新人，决定除了新加坡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管辖新加坡。我国李光耀总理在1961年简明地总结了这种新的情绪。他说：

「我的同僚和我，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占领的那一代年轻人，並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就是决心不让任何人——不论是日本人或英国人——随意摆布我们。我们认定自己管理自己，在人民具有自尊的国度里培育我们的后代。」

严酷的战争锻炼了一代人的情感和性格，给新加坡主权国提供了缔造者。在大约150年的历程中，我们从一个外国统治的拓荒殖民地转变为拥有自己政府的安定社会。我们从以前的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呢？

大自然並沒有慷慨地賦与我国什么。我们既无天然资源，也没有耕地，甚至连止渴的饮水也不够。但是，我们有两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构成的财宝——位于马来群岛心脏地区的优良的天然港和两大洋之间的枢纽。但是，1819年前的新加坡历史告诉我们：固有的贸易要衝本身，並不足以把新加坡发展成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口。虽然至今还没有人可以充分解释1819年之前新加坡为什么藉藉无名，但是，新加坡在现代史上的崛起，是它成为西方最先进工业国和最强大海洋国家的港口的直接结果。大自然賦与我们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在天然资源方面却非常吝嗇，所以新加坡的进步主要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奋发图强。

在一个贸易和发展受到传统性社会和其他殖民势力重商惯例妨碍的地区里，只有新加坡的贸易和发展，是建立在亚丹斯密的著作「国富」所阐述的，当时是革命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新加坡是一蹴而就的例子，这是由于它至少比东南亚最接近的竞争者提前一个世代组织贸易和发展工作。它让所有国家的商人和劳工前来这里发展。在历史上，新加坡的繁荣一次又一次地遇到挑战。但是，牟利的冲势从未松缓过，因为我们的商人足智多谋，适应力强，也因为新加坡门户一直保持开放，让技术诀窍、新的贸易方式和新工艺源源进入。现代熔锡技术，正是靠新加坡最先引进东南亚。橡胶和割胶技术，也是通过新加坡传入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西方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胶园和在锡业中引进资本集约的精密采矿工艺，正由于新加坡的代理商转变为管理机构。因此，新加坡之所以繁荣，在于它愿意接受变革和进行变革。一切足以促进新加坡发展的，都在受欢迎之列。新加坡之所以繁荣，也因为它在日本开始南侵之前将近120年内，享有

连续不断的和平。而且，东南亚法律与秩序的发展，以及本区的和平，也使新加坡的贸易受惠——这个历史事实提醒我们，如果东南亚处于繁荣与稳定之中，我们将能获得好处。

我们的先辈对新加坡的成功或失败並不负起最后责任。这个担子落在英国人的肩上，因为他们掌握新加坡的主权。因为英国人负有最后责任，他们也必须负责保卫新加坡。如果新加坡港失败，我们的先辈可以选择重返故园的途径——虽然未能从拓荒经历中获益，但至少还有一个退身之处。如果新加坡被攻占（它的确被日本人所攻占），等到英国军队重新占领新加坡时，将使人产生如释重负之感，因为对英国人而言，新加坡的沦陷只是大英帝国丧失一个哨站，而不是丧失他们的乡土。

正因为新加坡取得成功，並从拓荒年代成长为根深蒂固的、有足够的信心自行管理的多元种族社会，我们对自己乡土的成功的利害关系，就要超乎寻常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份子和一视同仁的主人，对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功负有最后的职责。成功于我们有既得利益，这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成功是每一个论功行赏社会为之奋斗的美德，而是因为失败的悲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们的祖先移居到这里时，往往身无分文。当时，这是一个粗俗的、无情的拓荒社会。然而，他们是坚强的人民，不为社会的艰辛生活所难倒。在这个社会里，那些奋发图强和力求上进的人，往往能出人头地。现代的新加坡，正是建立在他们的劳动成果之上。

但是，对我们上一代和先辈是足够的繁荣和安全的基础，对我们和我们后代都不再是足够的了。在20年中，我们已认识到，贸易本身和它的扩展速度，已不足以给我们提供繁荣和就业机会。我们已接受工业化的必要性，而且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如今正处于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初步阶段。因此，在我们的祖先来到新加坡之后约160年，我们又再带头进行如果我们要继续享有繁荣，同时要成功地应付竞争日益剧烈的世界的挑战，我们必须像先辈那样，把自己组织起来，有效地走在别人前头，以同样的刚毅、智慧和决心，奋发图强，力求上进。

但是，我们的环境有一个基本的不同点：现在我们必须保卫自己。1942年新加坡沦陷的教训是，我们不能依靠别人保卫我们的国土，因为他们不会像保卫自己乡土那样作出相同的承担和努力。现在，如果我们在保卫新加坡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将不会有人为我们驱退占领军。我们将永远失去自己的祖国。

A VIEW OF OUR PAST

DR. WONG LIN KEN Raffles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efore 1819

To all nations, there is a beginning. In many, the beginning is part fact and part myth. Such also is the origin of our country. It is wrapped up in the mystery of its name, SINGAPOR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an older name, SINGAPURA, the lion city.

The mystery begins with the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Singapore in the *Malay Annals*, or the *Sejarah Melayu*. The *Sejarah Melayu* is not history as we normally understand it to be. It i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about royal courts and their rulers, mostly Malays, and centred on the greatness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 It was commissioned by a Sultan of Malacca, and written for his greater pleasure. The stories were about men of bygone days, and written by the author as he received them from his father and his grandfather, who in turn heard them told by other older men. In the telling, fancies became woven with facts. Thus, the *Sejarah Melayu* makes for interesting reading, which good history should be, but it is also a problem for historians, who have to winnow the historical facts from the fancies of the story tellers. Nevertheless, the *Sejarah Melayu* is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Malay history. It is based on a hard core of historical truth.

What has the *Sejarah Melayu* to say about the origin of Singapura?

According to this Malay account, the early name of Singapore was *Temasik*. Here Raja Chulan stopped on his way to conquer China. He was a mighty warrior king of India, and a descendant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is ambition so frightened the Emperor of China that he resorted to trickery to stop the impending invasion.

He sent to *Temasik* a boat manned by toothless and senile men, with a cargo of rusty nails and trees in full fruit. These men told the Raja that China was so far away from *Temasik* that they had aged during the journey, while the nails rusted, and the trees matured and fruited from the seeds originally sent as cargo.

Thus dissuaded by the distance of China from invading it, Raja Chulan decided to descend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There his enterprise was rewarded with marriage to the daughter of the god of the sea.

To them was born Sang Utama, who took on the title of Sri Tri Buana when he became the ruler of Palembang, the centre of the great Malay empire of Srivijaya. In one of his hunting expeditions, Sri Tri Buana had a glimpse of the white shore of *Temasik*. Attracted, he was determined to explore the island. He landed at the estuary of the Singapore River, where he met a strange white-breasted animal, with a black head on a red body, which a courtier claimed to be a lion. Thereupon he decided to

stay on the island to found a city, which he named Singapura, after the animal he had seen. So, *Temasik* became Singapura and grew into a flourishing trading port under Sri Tri Buana and his four successors. Its wealth became the envy of its neighbours so that, at different times, it was invaded by the Cholas, the Thais, and the Javanese.

The *Sejarah Melayu*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Singapore is delightful. It is also important, because Singapore is thus claimed to be the first kingdom of the Malay founder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 Portuguese sources named him as Parameswara, a Palembang prince who fled to Singapore, after an unsuccessful rebellion in Sumatra against the power of Majapahit. In Singapore, he slew the local Malay ruler, a vassal of Thailand, and ruled for five years, before he was driven away by a Thai fleet. He was a fugitive at Muar and Bertam for nine years before he founded Malacca at the turn of the 15th century.

This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Singapore in the *Sejarah Melayu* does not square with Portuguese sources. The fragmentary evidence provided by Chinese records and the Javanese *Nagarakretagama* of 1365, the earliest indigenous Southeast Asian writing to refer to a settlement named *Temasik* on our island, do not provide helpful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This is one of the two main reasons that have complicated the acceptance of the *Sejarah Melayu*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Singapore.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no lions exist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except, of course, in the zoos. Historians have tried to account for the naming of our island as Singapura. They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explanation that a tiger was mistaken for a lion. Tigers were plentiful in Singapore and even up to the 1870s, one could go tiger hunting in what is now the Bukit Timah campu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explanation is simply too pat to be possible. Furthermore, until 1835, no tigers were reported to have been seen, and when they became a problem,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y swam across the Straits from Johore for reasons never adequately explained. Some historians have linked the name with Singesari in Java, or with a Buddhist sect in early Majapahit, whose adherents acquired the dubious reputation of lions because of their wild orgies.

A more recent and also more plau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Sri Tri Buana and Parameswara were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as Iskandar Shah, the name assumed by the founder of Malacca, and last ruler of Singapore, after he was converted to Islam, in later life. After he had been driven out of Palembang, Parameswara re-established himself at *Temasik*. Here, he asserted his

independence from Majapahit by ascending a lion throne to make himself an incarnation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Buddhist rituals of South East Asian kingship before the arrival of Islam. He then re-named Temasik Singapura, the lion city, as a symbolic act of independence from Majapahit. According to this view, except for the brief reign of Parameswara, Singapore had no distinguished history. An earth wall remnant of his lion-city could still be seen in 1819, the year Stamford Raffles founded modern Singapore, stretching from the sea for about a mile, along Bras Basah stream, now a canal, to Bukit Larangan, present day Fort Canning, and by repute the burial ground of the ancient Kings of Singapore.

Thus, in recent years, historians have cast doubt on the claim of the *Sejarah Melayu* that Singapura was ever a prosperous entrepot in the past. Singapore could possibly have been one of the numerous unplaceable names of trading poi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writings of the Arabs and Chinese and in the Ceylonese and In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9th,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But it was the widely-travelled Wang Ta-yuan who gave us the first incontrovertible account of Singapore as a settlement some time in the 1330's and 1340's. Significantly, as a portent of present-day multi-racial Singapore, the settlement had a mixed population of Chinese and indigenes, probably Malays and Orang Laut, who lived not by agriculture or commerce but by off-shore piracy. Indeed, Singapore ha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 pirate haunt well in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ingapore was not a safe settlement for its inhabitants and traders. What has survived of its early history in records is, in the words of one historian, "a bare recital of piracy and sieges." Conceivably, it began as a small Malay trading port in the maritime empire of Srivijaya, and suffered a Chola raid. Historians do not agree on the number of times, Singapore was sacked by Majapahit. But, it definitely became part of this Javanese empire before 1365. When Parameswara set up his rule in Singapore, the island was already a Thai dependency. He was driven from Singapore by either a Thai or Majapahit expedition. Subsequently, Singapore became a vassal state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 Singapore lapsed into greater insignificance with the Portuguese conquest of Malacca, and especially after 1613, when the Portuguese sacked a Malay outpost at the estuary of the Singapore River.

In the Johore Empire that succeeded the Malacca Sultanate, Singapore and the adjacent islands, Johore, and portions of east Sumatra constituted the fief of the Temenggong. The Sultan finally settled in the Riau-Lingga Archipelago.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emenggong Abdu'r Rahman founded a small Malay village on the site of the old lion city. When Raffles landed in Singapore in January, 1819, the island's population was about 1,000, made up of about equal numbers of Chinese and Malays, some 20 to 30, and the rest Orang Lauts, scattered in four communities in the Seletar, Kallang, and Singapore estuaries, and in the vicinity of what is now Keppel Harbour.

What we know of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before 1819 indicates that its development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territorial ambitions of Srivijaya, Majapahit, Thailand and the Malacca and Johore Sultanates. It had changed its overlord several times, according to the fortunes of the early empires in Southeast Asia. But no historian has yet adequately explained why Singapore failed to be a major trading centre before the 19th century.

It is popular knowledge that we owe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as a trading port to our island's geographical position. Lying at the tip of the Malay Peninsula, Singapore is on the cross road of trade that plies between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 In the days of sail, when ships depend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monsoon to sail to and from Southeast Asia, trade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had necessarily to be centred on the sea lanes favoured by the winds, and its conduct was organi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mporia. Singapore could have qualified for this role, but no historian has yet provided an adequate answer as to why Singapore did not fulfil it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19th century. Before this, the emporia of eminence in trade between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 had been, at various times, places like Palembang, Jambi, or Melayu in the days of Srivijaya, Malacca under the Malay Sultans and later under the Portuguese, Jakarta (then known as Batavia) under the Dutch, Brunei, and Riau toward the end of the 18th an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historical time scale, Singapore was the most recent emporium to emerge, the product of early 19th century events, and part of the emerging pattern and nexus of world trade, dominated by Britain as the world's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d foremost naval power. Thus the Singapore from which we have evolved as a nation rested on modern foundations.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Singapore became a British possession because Britain needed a port at the southern end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to complete the dominance of this important waterway that connects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 The need for Britain to achieve this strategic dominance was the gradual lesson learnt in four major wars in which

Britain fought France and its allies to prevent the French from becoming the paramount power in Europe. To achieve this, Britain had to have naval mastery in the Atlantic and the Mediterranea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1756-63), Britain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power in India. This enable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o develop its resources in India for the expansion of trade with China. B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this trade had become a valuable segment of the triangular trade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India. Henceforth, British national defence against France included the protection of British interests in India. It pivoted on naval mastery, not only of the Atlantic and the Mediterranean, but also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link into the Pacific, the Straits of Malacca.

Reinforced by the experience of naval engagements in the War of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83), the lessons of the Seven Years War led to the founding of Penang by Francis Light in 1786. At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t was potentially a naval base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Bay of Bengal, and a forward port on the trade route to China. So long as Holland, then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remained neutral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rance, the Straits was secure for British ships and trade. But Holland was on the side of France in the Wa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1802)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1803-15). So, to secure the safety of India and its trade with China through the Straits of Malacca, Britain had to occupy first Dutch Malacca and then the rest of Dutch Indonesia.

At the end of all these wars, Britain emerged as the dominant naval power in Northwestern Europe. It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architects of a European peace-settlement that more or less endured for a hundred years till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In this settlement, the security of India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olland as a bulwark against France in Europe were some of the major British national objectives. France and Holland were completely removed as European powers in India, while British naval mastery in the Indian Ocean was ensured by keeping Mauritius,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Ceylon, all captured during the war years. However, European considerations led to the retrocession of Dutch Indonesian possessions and Malacca.

This move alarmed several local British officials east of the Cape. For it would leave the Dutch the strategic dominance of the Sunda Straits and the southern entrance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to the South China Seas. Britain would be left with Penang, too far north 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Bencoolen, on the wrong side, facing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event, it was Stamford Raffles, more energetic and persuasive than several others with similar ideas, who successfully persuaded Lord Hastings to commission him to sec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ation beyond Malacca, such as may command the southern entrance of these Straits." Thus, Stamford Raffles became the founder of the modern settlement of Singapore.

Like so many of those who made their fortunes in the settlement he founded, Stamford Raffles was a self-made man. Born in 1781, he was self-educated, and rose rapidly from being a clerk i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become, when he was only 30 years old, its Lieutenant-Governor of Java from 1811 to 1816. In 1818, he was appointed Lieutenant-Governor of Bencoolen, a post he retained until his retirement some five years later. When he was in Java, he conceived of a British empire based on occupied Dutch Indonesian territories, but this, and his other efforts to expand British power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were defeated by post-war British policy to allow the Dutch to be a power in the region. In fact, but for the support of Hastings and the instantaneous success of Singapore, even Raffles' Singapore venture would have been disowned by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London, for the Dutch, who were quicker to grasp the threat Singapore posed to their Archipelago trade, as well as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disputed the legality of the British title to Singapore.

Riau, not Singapore, had been the priority objective of both Raffles and Hastings. In Riau, the Dutch had forestalled the British by re-asserting their protectorate, first established in 1784, and Singapore was finally resorted to because other sites had proved to be unsuitable. But Singapore was part of the remnant Johore Empire now centred at Riau. To give a legal basis to the acquisition of Singapore, Raffles signed a treaty, dated 6 February, 1819, with Temenggong Abdu'r-Rahman and his half-brother Hussain, a rival claimant to the Johore throne, whom Raffles had brought into Singapore and proclaimed Sultan for the purpose of concluding the agreement.

The Dutch disputed the legality of Raffles' action. In the fateful delay involved in resolv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British right to Singapore hung the future of the settlement, for the time thus gained brought into full relief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value of Singapore to British trade i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eastward beyond the Bay of Bengal.

Among the agreements made in 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the Dutch gave up Malacca and all claims to Singapore, withdrew their interest in the Malay